

忆念赵万里先生

冀叔英

赵万里先生逝世两周年了。赵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而赵先生献身于图书馆事业，毕生致力于古典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和研究工作，同时尽心竭力为古笈全面考虑、悉心安排，所作的贡献，回忆起来，也是值得我们忆念的。

一九二五年赵先生来到北京，拜王静安（国维）先生为师，后来就在清华国学研究所，任静安先生的助教，这期间，得到静安先生的指导，在史学、文学、戏曲、金石、考古、版本、目录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人谓能传王氏之学。更为可贵的是，先生同时也传了王氏治学严谨的学风；从事图书馆工作五十余年，在治学与治事方面，贯彻谨严、认真的精神。先生早年校辑宋金元人词，是大规模采用辑佚方法，辑出宋、元以来散佚的词集，全书共收词人七十家，得词一千五百余首，材料之多，固为前人所不及，而方法和体例之谨严周密，尤为人所称道。书中所收材料，均详举出处，原不限于《永乐大典》，每词注明引用的原书，有的词引用来源多至数种乃至十余种，也都一一注明原书并注出卷数，还注明不同本子的异文；疑信不定的词，列为附录，也都详加考校，用力至勤。此书一九三

一年由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时先生二十六岁,是属于青年时代的研究成绩。先生对待研究工作的一丝不苟,从青年时期到晚年是始终如一的。先生早年收集出土墓志,并加考释,以地下材料与史事互证,成绩甚著,三十年代后期已卓然成书,并拟付印,因抗战期间,未付实现。二十年中,又经增订、删补,一九五六年编为《汉魏南北朝墓铭集释》,始由科学院考古所编入“考古学专刊”出版,其审慎可见。校辑《元一统志》,也和《校辑宋金元人词》一样,体例严谨,方法周密,从材料的编排以至标点上,都体现了勤奋从事,严肃认真的精神。

先生为访求、搜集古笈,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他对研究工作倾注的心力,可说是等量齐观的。他从最初为图书馆访书购书以补充馆藏,到进一步把访书看作是保存一代文献的崇高意愿,而且自愿地把保存文献作为至上的事业,并引为己任。这一点,和郑振铎(西谛)先生是相同的。抗日战争年代里,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基本上已南运,西谛先生正孤处上海,有识之士对当时流传在市面上的古笈,都深虑恐遭“外流”之厄。赵先生那时几乎每年暑假都去上海一行,主要是为了和当时处在内地的北平图书馆负责人取得联系,争取一些经费,搜购一部分亟应保存下来的善本。这项工作,实际是在郑先生大力帮助下共同做的。著名的明代藏书家赵琦美抄校的《古今杂剧》,就是这几年中所收书的高峰;此书收得后,即送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保存,胜利后连同这期间所收的其他书,一起运抵馆内。整个经过,郑先生后来写成《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文,作为附录,收在《劫中得书记》之后。解放后,郑先生来到北京,先后主持文物局和参加文化部领导工作,老朋友成了工作上的领导,二人在访书和保存一代文献上的宏愿,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更取得丰硕的成果。建国以来,许多收藏家自愿向政府捐献自己的珍藏;以图书而论,如铁琴铜剑楼瞿氏、常

熟翁氏、江安傅氏、建德周氏、宝礼堂潘氏等著名的藏书家，通过文物局向北京图书馆捐赠了不少名贵的孤本秘笈；这期间，经过多方访问、联系，赵先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还有些侨居港澳的收藏家，所藏的大批珍本将有出手之意时，由于周总理的关怀过问，先生协助并依靠组织，及时前往鉴定，几次将成批的珍本图书、碑帖，及时收购回来。先生对祖国文化遗产无比热爱，加上学识渊博，对古笈有真知灼见，才能做出卓越成绩，在一九六四、六五年时，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

先生对待书笈的热忱，也是无与伦比的。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不久，党和人民政府就把抗战期间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抢救出来的金代刻本大藏经，送交北京图书馆。“金藏”到馆时，先生兴奋极了，亲自察看，并筹划清点、安置的措施。由于抗战期间物质条件差，全藏四千三百多卷大部分都受了潮，已揭不开，当务之急，是如何重装整修问题。（藏经是卷子本，装修时需揭裱，不同于一般古旧书，技术要求也不尽同。）经馆领导的支持，先生一方面通过琉璃厂旧书行业，寻访以裱工见长的装修师傅，一面想方设法，搜求装裱必需的绵纸（一种很细而薄的手工纸，以河南、广西等地所产为佳）。因为“金藏”是国内现存的孤本，历经艰苦得以保存下来，在当时确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九月份，建国前夕，先生主持在馆里开了一次“赵城金藏”展览会，先生自己撰写展览说明书，除介绍“金藏”成书渊源始末，和抢救保管经过外，重点说明展览意义；其中说到“反动派造谣说共产党不要文化，‘金藏’的保存下来，就是对他们的一记响亮耳光。”当时到会各界人士济济一堂，如李济深先生、巨赞法师诸人，都热情提出愿为装修“金藏”尽力，后来李济深先生捐赠了一批广西绵纸，当年“金藏”的整修工作就顺利开始了。这项工作经几位老师傅的辛勤操作，历时十五年，到一九六五年，四千三百多卷大藏，已全部按照原来样式，装修完成。继“金

藏”之后，数年间，各地藏书家捐赠书笈，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是空前之高，一九五〇年到五一年，在赵先生主持下，北图先后举办“新收善本书展览”、“《永乐大典》展览”等，每次展览，先生都是亲自选书并写说明，宣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之发展，举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分子任意掠夺我国文化和艺术遗产的事例，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爱护和重视这些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使之不再遭受散佚和掠夺，还将会进一步发扬其固有的学术价值，使人提高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热情。

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也反映到治事，或说是一般事务性工作上来。一九五〇年，原北图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办事处工作结束，抗战前寄存在上海的敦煌写本和善本乙库地方志等都运回馆内，这一来对善本书库是个很大的压力，原有的空间，已为胜利后新入藏的书占去了，空间、书柜都成问题，而善本书还要妥善保管。赵先生和别的同志一起，在书库里左转右看，当时也没用什么皮尺、盒尺，只是手拿一把鸡毛掸，在四库书库一排排大书架之间量来量去，最后决定，大书架之间空隙，留出一人可走的通道，可放若干排书箱。书箱从哪里来？当时正当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一下也做不成大量的书柜或书箱，书需入库是不能等的。恰值藏书家前辈傅增湘老先生在上年作古，遗嘱将所藏大批线装书捐赠家乡四川图书馆，书的托运是由北图代办的，于是和傅宅商量，运四川的书要装大木箱，傅氏原放书的书箱不宜托运，不如作价让给北图，傅宅慨允。收下这批书箱后，乙库地方志和其他书，整整齐齐全部装入六十多个书箱，依次排列安置在库内，很快就供应读者阅览了。多年来，先生对线装书（主要是善本书）的装订工作，也是经常亲自过问并加具体指导的（所谓指导，是原则上如何做，不是技术上的）。书笈之流传久远，与装修工作有直接关系，我国历来的藏书家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藏，当然

更应着重抓起来,尤其北图的藏书,一部分还是直接从清代内阁大库继承而来的呢!这样的书,不论内容,就书而言,很多也都具有文物价值。先生常说:“不单是宋、元时代的蝴蝶装,就是明、清时代的原装,也不能轻易破坏。”所谓“破坏”,听来似乎严重了一点,实际上是说改变原有装订形式(如蝶装、包背装改为线装),做成面貌一新的样子;或是撤掉旧书皮,换上新封面,不看是什么书,都采用这样的做法是不行的。如果历来都这样搞,今天也就不知宋代蝴蝶装是什么样式了。因之,几十年来,他对馆里的善本装修工作,坚持贯彻“整旧如旧”原则,装修过程中,决不许“剃头修脚”(指书的天地头不得任意切去见新)。建国之初,北图专做善本装修的,共有五位老师傅,个个技术精湛,在国内同行中也是闻名的,但年岁都在四、五十岁了;考虑到十年之内,不成问题,二十年后就难说了,因之在五十年代北京旧书业公私合营之际,就有意寻访书业中装修技术较高,而有待就业的,经馆领导支持,又请了三位师傅来馆,其中一位,即是现今健在,有“国手”之称的张士达老师傅。有了技术力量,还要有物质条件,比如补书的旧纸,副叶的选配等等,他全都时时在念。多年以来,先生经常出入琉璃厂等处旧书店,除了访书购书,见有书店中装订拆下的旧纸,只要适合应用,也必买回来,送交装订室备用。每次去南方出差,总要亲自选购适于订书用的粗细不等的丝线,因南方丝线质量好。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只要对书有好处,什么我都愿意做。”

先生为培养新生力量,以期后继有人,也做了不少安排。一方面从业务上着手,开班讲授“应用目录学”;先讲史学部分,讲授内容针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具体情况,和在北大等校讲“史料目录学”不尽相同,着重基础知识和目录学范围内的常识。如某一代史书,正史纂修情况,正史以外的史书有多少,其他有关历史范围的著作,内容质量如何,最后介绍各书版本及流传情况。讲文学部分也

如此。参加听课是自愿的，不限于善本特藏部同志。到六五年，开始讲经部目录学，开始不久，因十年浩劫而中止。另一方面，他对古旧书装修工作，时刻在念；我国的装修技术，是有优秀传统的，许多老师傅是过去旧书店学徒培养起来的，今后怎么办？先生和当时前辈徐森玉、周叔弢诸老先生聚会时也常谈论此事。后来徐老和周老二位在全国人代会上联合作为提案提出，经文化部落实，举办“古笈装修培训班”，每期学习二年，学员由全国各馆推荐，由北京图书馆和中国书店的老师傅们同时各带一个班。培训班从六一年起，举办了两期，为全国省、市图书馆和其他单位培养了一批装修专业人才，第三期没有学满，十年动乱一起，宣告终结。有人建议先生应多作些研究工作，不要多牵涉这类事务性的事，先生却不认为装修书是小事，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只因为装修工作直接关系到古笈寿命的延续，所以非抓不可。还是那句老话，“只要对书有好处，什么我都愿意做”。这是先生的一贯主张。

作为赵先生的学生，我在学校时，上过先生的“校勘学”和“版本学”的课，当时因为没有实际接触过什么版本书，印象不甚深刻。到图书馆工作后，在先生指导下，第一提出要我记住五千种书名和五千个人名，这当时使我吓了一跳，用多少功夫才能达到要求呢？通过一年年的编目实践，我逐渐懂得了不记住书名、人名是没法干好这项工作的，确实应该由此入手。有时先生也指出：“这个人要记住”，“这个问题要搞清楚”等等。工作中遇到问题，自然要向先生请教，有时问过的问题，再遇到又问，则不再告诉，只说“想想看”，对某一名家笔迹也是如此，见过或请教过的，下次仍不记得，就说：“这是‘熟人’了，想想看”。由于自己基础不足，水平低，学习不够，领悟很差，直到如今，还只能说是个没达到及格标准的学生，但先生的教导和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是不能忘的。